

侯馬史史資料

顏景懷



第六輯

顏

侯马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一九九六年十月

侯马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侯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月

封面设计、篆刻：杨辰秀

题字：廉振华

侯马文史资料

一九九六年十月

主 办：侯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 刷：侯马市印刷厂

工本费：10.00元

主 编 柴进发
古维正 (兼)

副主编 杨辰秀

编 委

乔 木	赵以淳	吴清亮
雷晓山	李法甲	李佐荣
廉振华	董光辉	李风雨
杨辰秀	古维正	

校 对

王志敏	丁育萍	郑月梅
-----	-----	-----

贺《侯马文史资料》第六辑改版

曾刊五辑文集丰富供资政；

重改一貌史料翔实当育人。

李风雨 撰联

目 录

卷首语 路逸民(1)

侯 马 人 物

彭真同志三次回乡视察期间谈话纪要
..... 李法甲 王志敏(3)

回忆彭真委员长少年时代在二高就读的情况
..... 赵德录 关嵩峰 郭从谨 郭 琚 口 述
侯马市教育志编导办公室 整理(16)

抗 日 烽 火

上马惨案 董光辉 杨辰秀 整理(20)
侯马热血儿男爱国抗日二·三事 雷晓山(23)
回忆日伪时期侯马地区机构设置状况 教瑶轩(27)

忆我的祖父乔漪艇 乔 木(138)

解 放 战 争

忆古镇侯马解放前后 教瑶轩(32)

古 迹 新 探

晋国早期君主新析 李 一(36)

《台骀庙怀古十韵》注 杨辰秀(38)

《台骀庙怀古十韵》释文 李 一(43)

《台骀庙怀古十韵》注释后记 杨辰秀(44)

台骀庙今昔 贺际泰(48)

台骀庙话古 杨辰秀(57)

文 教 史 话

张景良——晋都电影放映第一人 常文岱等(62)

皮影戏后台老板——杨茂盛 雷晓山(63)

侯马市南上官村《创建义学小引》及《义学条目》碑文注释
..... 杨辰秀(65)

忆侯马市碗碗腔剧团成立的经过 董光辉(70)

侯 马 民 俗

民间风俗一年的禁忌 马安义(74)

侯马的葬礼琐谈	边春凯(80)
---------------	---------

地 名 探 微

山西地名与春秋晋国	景元祥(85)
新田地名始末考	杨辰秀(89)
侯马村名录	杨辰秀(97)

侯 马 古 今

侯马镇旧貌记	马安义(129)
侯马驿站考	杨辰秀(131)
晋生铁工厂概况	教瑶轩(135)

新 田 艺 苑

台骀锣鼓	贺际泰(142)
台神花鼓	贺际泰(159)
台神旱船·小车	贺际泰(188)

扉页图版

民间剪纸《剪蝎子》	董光辉
-----------------	-----

卷首语

路逸民

又是一个金秋十月。

今年的十月，不同于往年。是一个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与学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掀起热潮的十月。

在这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十月，改版后的第六辑《侯马文史资料》出版了！这是在侯马市委、市政府领导关怀以及支持侯马文史工作的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侯马市政协为推动侯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作的一点贡献！

改革开放后，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方面。侯马的文史资料工作，也同全国兄弟县市政协出版的文史刊物一样，将建国后资料的征集、整理、出版作为工作的中心。

第六辑《侯马文史资料》，为抢救“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资料，收集、整理了彭真委员长的老同学口述的《回忆彭真委员长少年时代在二高就读的情况》的文稿。侯马埕上村，是彭真委员长的故乡。建国后彭老曾三次回故乡视察，并作过重

要的讲话。《彭真同志三次回乡视察期间谈话纪要》就是较全面、翔实记录了彭真委员长这一至今对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而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抗日战争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是,为了永远不忘国耻,不忘历史,本辑刊载了重新调查,整理的回忆《上马惨案》和雷晓山先生撰写的《侯马热血儿男爱国抗日二三事》等文章。

侯马是晋国的遗址,晋文化源远流长。弘扬晋文化,提高侯马的历史地位和知名度,是我们的任务。因此,本辑仍以较大的篇幅刊载侯马的历史资料。

《侯马文史资料》原为16K本,大号字印刷。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已不能适应其飞速发展形势的需要。为此,第六辑改版为大32K本,胶版印刷,以便交流、收藏。

读者见到的这辑《侯马文史资料》是一辑内容丰富,选题多样,资料翔实,十分宝贵的资料。谨向为本辑撰稿、制图、评审、编辑和给予支持、关心的同志,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我们业务水平和人力、财力的有限,仍会存在一些问题。望各界人士多加批评,指正。

1996.10

彭真同志三次回乡视察期间 谈话纪要

李法甲 王志敏

(一)

1961年,是我国经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也是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个调查年。就在这年的四月和五月,彭真同邓小平同志一道共同领导了五个调查组,亲自深入到北京市的顺义、怀柔等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12月1日,彭真同志第一次回乡探亲和视察。途中,他反复告诉身边的同志,他这次回乡探亲是一回事,但回来的目的主要是看看怎么样。他对大家说,要利用这次回乡的机会,深入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12月2日到达太原,他一下火车连休息也不顾,就深入到太行仪表厂、矿山机器厂等去视察,了解工人生活和工厂生产情况。在迎泽宾馆向山西省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作重要报告,其中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12月3日,他在从太原前往晋南途中,与陪同他的省、地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促膝交谈,而话题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问题,关于克服片面性的问题,以及关于在工作中不要记小错

的问题……。

彭真同志说：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认识世界的，每个人都有他的片面性，许多片面性抖起来就成了“全面性”了。马克思写《资本论》就是这样，《资本论》中的注解最多，有的是批判别人的观点的，有的则是接受别人的观点，从这些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如何下功夫搞调查研究的。现在不是提倡“三不”吗？这“三不”不是现在才提倡的，毛主席在1943年就已经提出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了，“三不”只是解决了一个言者无罪。完整的概念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一条，再加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六条政治标准，言路就开了，事情就好办了。不然“三不”就没有原则了，就没有基础了。

彭真同志说：我们为什么要一向强调调查研究呢？因为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都存在有片面性，因此需要调查研究。他特别强调“尤其要听听反面意见”。

12月3日，彭真同志回到侯马垆上村看望了老母亲和乡亲们。之后，视察了浍河水库、新绛工艺美术厂等，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生活和疾苦，召开了干部座谈会，询问当地的生产和建设，并根据实际情况，为家乡的建设和群众的生活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做出了重要指示。

在调查研究中，他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每个事物都有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健全的思想都要经过否定之否定，但不是每个事物都得经过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总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势必要找各种不同意见，

让各种不同意见都讲出来，自己纠正别人，别人纠正自己，有肯定，又有否定，思想是无限否定之否定。对于这些思想和认识，彭真同志同干部群众座谈时，又特别结合 1958 年和 1960 年间，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一时期，我国经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尝试，史称“大跃进”时期。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忽视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在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虽然努力作了纠正，由于 1959 年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这种努力，加上自然灾害和来自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给我国造成的损失，致使 1959 年至 1961 年的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对于这些彭真同志总是反复告诫大家说：发表意见，说话，不一定成熟才说，哪有一下子就考虑成熟的？成熟的意见得有一个过程。鲁迅说过，每个人都要经过穿开裆裤的阶段。我们有很多人喜欢自己讲了叫人家拥护，那有讲了就百分之百的对的？能做到百分之七十、八十对就不错了。

又说：事情不合乎客观实际，终究是要翻案的。比如秦始皇翻案了，曹操翻案了。所以必须把各种意见都引出来，都使他发表出来，然后才能克服片面性。全部二十四史，概括起来讲了八个字：多谋善断，知人善任。古语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不论那一个朝代和那一个历史人物，脱离了群众，一定灭亡。如汉刘邦，他个人在某些方面就不如韩信、张良、萧何，可他能运用这些人的一技之长，他就成功了。项

羽不会用人，不能知人善任，就失败了。一个事业的成败，就看你会不会选用干部，选用的好，就能成功，选用不好，就要失败。在政治上要多谋善断，在组织上要知人善任。

彭真同志在讲到如何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同志，特别是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青年同志时，他对大家说：属于工作方面的错误，人人都有，对人要有基本的看法，要从长期的行为中看，不要从一点事情上看，尤其是青年人，最富于幻想。

对于同志们的一般性缺点、错误，不要揪住不放，人谁能不犯错误呢？对同志不要记小错，那样只能是弄一个宗派，我们共产党人要把那些小事扔掉，搞一万件小事革命成不了功，搞一件、两件、几件大事，革命就能成功。记小错不能团结大多数，所以，我们要搞大是大非。

12月7日下午，彭真同志离开侯马到运城视察。在听取运城县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他详细询问了这里的农业机械的质量如何，能不能使用和成本高低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彭真同志在洪洞县视察时，那里的同志就反映有些机械，群众不愿意使用。他认为，过去这方面没有因地制宜，凡是不合理的，都应该统统收回，原来多少钱卖给群众的，也要原价买回来，然后调剂到其他地方去，看别的地方能不能用，如果别的地方也不能用，就要考虑回炉了，不然的话，一万年群众也有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把基层干部的包袱卸下来，群众才能轻装前进。

当运城县的负责同志告诉他县里有人告县长包庇全国著名植棉劳模曲耀离的家庭成份时，彭真同志详细询问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原来，在评定曲耀离家庭成份时，根据当

时划定成份的政策规定,剥削收入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五便是富农,不足者为中农,而曲耀离的家庭剥削收入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四点九,还差百分之零点一。所以运城县县长坚持给这位植棉模范划为中农,为此,有人就告县长包庇了曲耀离。彭真同志说:不就差个零点一嘛!差零点一就算了,一定要实事求是,曲耀离同志还是热爱社会主义的,他在植棉生产上对国家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二)

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的彭真第二次回乡。4月24日,彭真同志来到太原,同山西省、太原市及部分厂矿企业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

在大家谈到学习外地经验时,彭真同志说:这就是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最根本的东西。是不是从实际出发,一个是唯物论,一个是唯心论。随便出发,就是唯心主义。学大庆是学它的精神,学它的本质的东西,同样学习马列主义、学毛泽东著作,也是学它的观点、精神和本质。彭真同志还说:形式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敌人,学大庆,不一定要去很多人去看,主要是学习它的精神实质,具体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对,还是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的“大庆”,要积极,但急躁不行,不要想一口吃成大胖子。

在谈到企业的管理问题时,彭真同志对大家说:组织问题,管理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

把苏联的经验，不管好的坏的都学来了，有些并不是先进的，我们也学来了。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企业管理怎样搞法，有共性的，有个性的，把个性的略掉，把共性的抽出来，大庆的经验是活的，大寨陈永贵的精神也是活的，你们有些单位也有自己的活的经验，搞出来了，就是个促进。他强调说：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实验。

对于先进典型的认识，他说：对于旗帜，不要神化，不要说没有一点缺点，大庆也是一样，不管那个典型，主导的是好的先进的，是模范，但总还会有缺点。过去，一树旗帜就什么缺点也不说了，别人不说，慢慢地连他自己也不愿说自己的缺点了，到后来，人家一去看，不是那么回事，结果慢慢就垮了。我们做领导同样有缺点，一个人做工作，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普遍真理。特别是劳模，你给他瞒缺点，他也觉得应该瞒着，结果就垮了，讲他的缺点并不影响他的威信，并不妨碍大家向他学习。

4月27日，彭真同志由陶鲁笏等同志陪同，视察了闻喜县东镇公社涑阳大队，听取了全国植棉劳模、农民科学家吴吉昌关于棉花丰产、棉花芽苗移栽经验的汇报，并亲手进行了棉花芽苗移栽。

那还是困难时期的一九六〇年，晋南地区种了三百多万亩棉花，由于干旱，造成了棉花的严重缺苗。时任中共晋南地委书记处书记的李广耀来到涑阳村吴吉昌家里，那时候，吴吉昌创造的冷床育苗法已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李广耀诚恳地询问吴吉昌，能不能创造个保全苗的方法。吴吉昌接受了这个任务，历经艰苦，反复实验，终于创造出了芽苗移栽法。打破了流传在晋南乡间棉农的格言：“哭不活的

娃娃，栽不活的棉花”。解决了棉花适时补充全苗的大问题，是棉花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晋南、闻喜党组织支持了吴吉昌，中共山西省委支持了吴吉昌。《晋南报》登载了报道吴吉昌芽苗移栽初步成果的文章《及时雨》；《山西日报》不但发表了关于吴吉昌的长篇报道：《敢于向困难斗争的人》，还发表了社论《向吴吉昌学习什么》。可是在推广这项新成果的过程中，却遇到种种麻缠：怀疑、争论、阻挠甚至反对……。

彭真同志在视察过程中得知这一情况后，深深地被吴吉昌的科学创造精神和革命的斗争勇气所感动。他说：吴吉昌进行科学实验的斗争精神很好，受了不少的气，可是，为了真理，不怕这些。最初说地球是圆的人受到了教皇的迫害，甚至被烧死。我们的社会是不会这样了。他高度评价这一成果：是中国棉花栽培史乃至世界棉花栽培史上的一次革命。他对当时随同他一道视察的《人民日报》记者何燕凌说：给你一个任务，详详细细了解一下吴吉昌创造芽苗移栽的前前后后，曲折的斗争经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样发生的，在村里经过什么斗争，与科学家之间有过什么分歧意见。在这些过程中，有保守落后思想的人，但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是热爱的，只是怕把事情办坏了。彭真同志强调说：在报道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注意这一点。

彭真同志还就反映吴吉昌的芽苗移栽法，提出了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他对记者精辟地说：报道中要说明这样的思想，什么是科学实验？有的可以在实验室里试验，有的可以不在实验室里试验。社会科学不能在实验室里试验，要在广大群众的实际斗争中调查研究，总结出来。自然科学中至少农业科学，农林牧副渔都在内，也可以这样做。把群众中的

零碎的不完全的经验集中起来,成为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经验,就是科学。农业处处可以搞试验田,试验室里做的也要再拿到试验田里试验。又强调说:我们并不否定实验室里的试验,应当两条腿走路。如在一块地里,发现一穗麦子长的特别好,留种繁殖后过几代再看看效果如何。在生产实践中,你能发现新事物的苗头,抓住了,扶持它,就能开辟新的境界。他特别叮嘱记者说:报道一下,目的不是整人,是劝大家包括科学家在内,不要太保守,要相信群众的实践,要相信群众的创造。

就如何搞好对吴吉昌事迹调查,如何研究处理所得的材料,在一次吃饭时彭真同志又特意把《人民日报》记者何燕凌拉到自己的身边,为记者讲起他那深刻透彻的调查研究方法论。他说:在研究中,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对敌人,对自己都要详细占有事实材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丝毫不夸大不缩小,不任意取舍,从确确实实的事实出发。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不严肃对待事实,在遇到这些问题时,就会妨碍认识真理。在叙述中,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叙述是参与一种斗争,不能不讲究策略,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恰到好处,这是一种艺术,原则性是一个原则,灵活性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原则。

研究,要从实际出发,掌握规律,棉花能栽已经是事实,过去没有栽过也是事实,从不能栽到能栽,是人们掌握了棉花生长的一种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总是会有人发现的,由吴吉昌发现了,这是偶然的。他从种瓜种棉花中发现了两个事物的共性,从中找出了一定的规律,过去作不到棉花全苗,人们就没有这方面的自由,现在作到了,一个客观存在的必